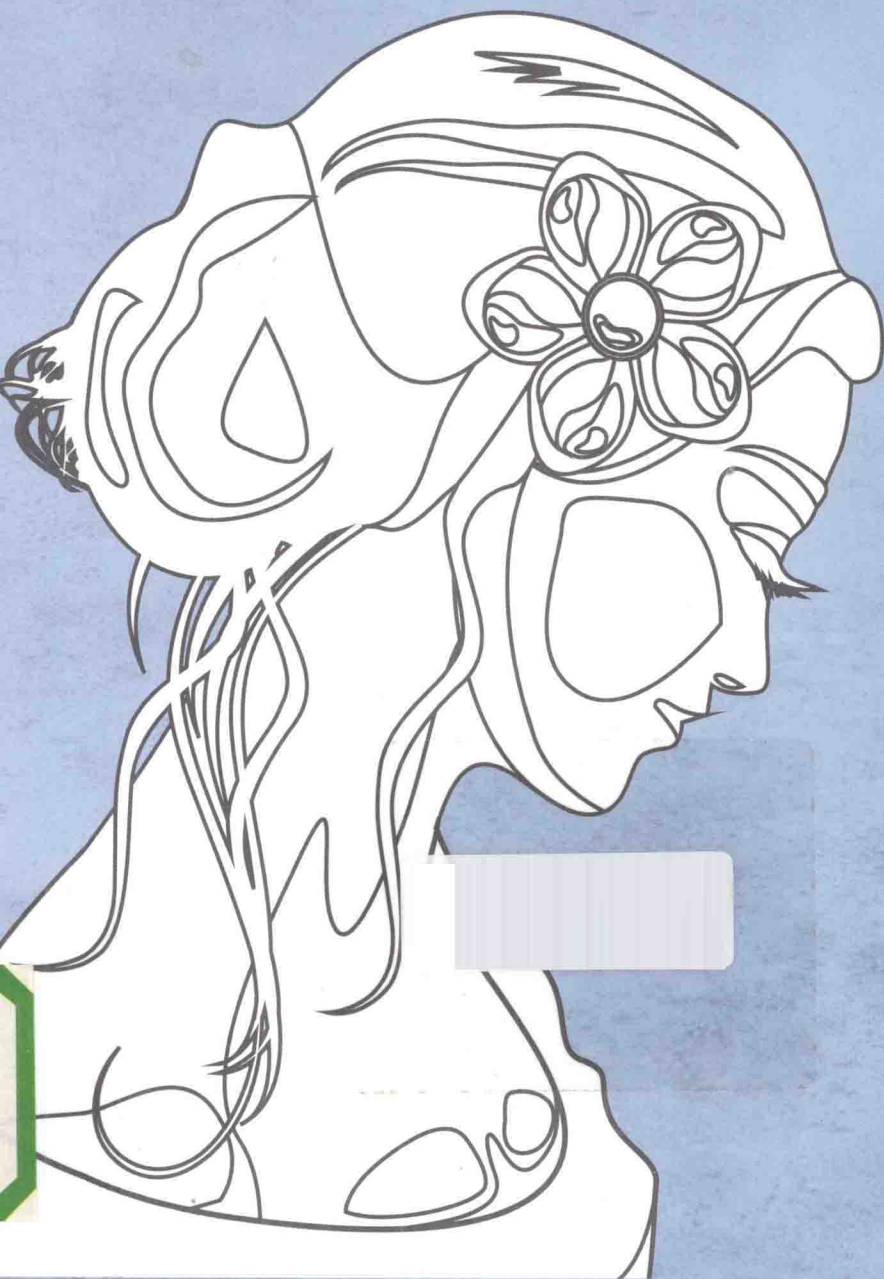


一 双眼睛两条河

童道明◎著



同名剧作《一双眼睛两条河》为“2014年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特邀剧目，蓬蒿剧场保留剧目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一 双眼睛两条河

童道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一双眼睛两条河 / 童道明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075 - 4210 - 3

I. ① —… II. ① 童… III. ① 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0714 号

一双眼睛两条河

著 者: 童道明

责任编辑: 纪希萱 赵彬彬 刘孟丽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 话: 市场营销部 010 - 58336267 58336270

责任编辑 5833619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4210 - 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道明一甲子（代序）

童道明

2013年8月8日，红丹丹文化中心出品的盲人朗读剧《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在北京先锋剧场演出，我去看了，演完之后还上了台，合了影：我站在中间，旁边是一位盲人演员和两位志愿者。于是我想到1953年8月的一天，复南姨妈给我和妈妈在北海公园拍过一张照。我把这两张相隔整整六十年的照片并排放到一起，嘴里喃喃说出了五个字：道明一甲子。

1953年，我16岁，翩翩少年；2013年，我76岁，垂垂老矣。

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于抗战，成长于新中国。我们这一代人的的人生道路也不平坦。我写过一首小诗，题曰《自白》：

我是一条小河

我的河水流不进海

我是一条小路

岁月将它拐了几个弯

但尽管“拐了几个弯”，我们都还是在曲折中前进着的。

我可能比较幸运，因为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好的老师，也遇到了不少好的机遇。

1953年，我上高二。那时的高中还没有实行文理分班，我最爱听的课，是特级语文教师李慕白老师教的作文课。2013年春天到母校北京五中作讲座，我说要感谢母校教会了我怎样写作文，这让我受惠终生，因为此后我一辈子都在写作文。

但真正涉及我人生走向的第一个重大机遇，出现在 1959 年：那一年我 22 岁，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要写一篇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很难写的论文，但我还是迎难而上了。

我们那一代留苏学生有一种纯真的情怀，可以把在外国人怀疑的目光下出色完成一项学业，看成是为祖国争了光。这种情怀是能焕发出极大的能量来的。

我的论文得到了拉克申老师的肯定。1959 年还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老师对我说：“童，我给你的论文打‘优秀’，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他给我的论文写评语说：“一篇独立思考的论文，写得饶有趣味。”

拉克申（1933—1993）老师是我的天字第一号恩师。他对我说了一句金子般贵重的临别赠言：“童，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这让我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

拉克申当时还是个青年教师，后来成了个大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一些专修俄国文学的学者到莫斯科去拜访他，他总要向他们提起我，这令我感动。

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活还有什么可以回忆的呢？那时年纪小，常想家。2001 年我出了本随笔集《俄罗斯回声》，开头的一篇文章《静夜思》里写了这样的回忆：“年轻的时候，住在莫斯科大学的高楼里，也常因为见到月光而思念故乡。特别是在他人都已跳舞去，此地空余宿舍楼的节日之夜，在华尔兹舞的撩人的乐曲声中，对着月亮想家，能想得落泪。”

在北京的妈妈也常想我，有一年中秋时节，她给我和在安徽工作的道荣哥哥分别写了封信，信里附有一首她写的诗，其中“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这句，让我感动与感伤了好一阵。

1960 年冬，我因病辍学归国。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每月



给我 25 元生活费，嘱我自己寻找工作单位。机会很快出现了。1962 年，中国剧坛出现布莱希特热。经过我的留苏老同学郭家申的推荐，我为《文汇报》写了篇《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这篇文章成了一块帮我打开工作之门的敲门砖。那年我 25 岁。

我也想不出是否还有比外国文学研究所更适合于我的工作单位。这个研究所起初由诗人、学者冯至任所长，由有老八路作风的延安干部王平凡任党总支书记，由《青年近卫军》的译者叶水夫任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我一直感念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和宽容。是的，我特别要提起“宽容”二字。我的妻子常对我说：“你多亏是在外文所……”我要感谢外文所对我时而跨界游移、“旁逸斜出”的宽容。

十年“文革”，不堪回首。多少苦痛、悔恨埋在了心底。说得出口的精神劳动可能就是这一项：在河南干校时，曾利用去信阳看病的机会，翻译了一个俄罗斯剧本《工厂姑娘》。后来我写了篇散文《一份译稿的诞生》，描述了那时的情境与心境：

“我一边翻译着，一边陶醉着。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六年中，我头一次动笔翻译，头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了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是更难的。”

文革结束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我征稿，我把这份在特殊环境下完成的译稿交给了他们，中译本《工厂姑娘》在 1981 年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为了说明在河南干校时的心境，有一个情景也值得一提：我常常独自一人在田野上痴痴地吟诵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句诗：“时光在流逝，那是最好的时光。”

1972年我从干校回京。也许是为了追回白白流失的最好时光，我一头扎进了北京图书馆。我用了整整五年时间到那里看书，每日去半天，风雨无阻，读的全是与戏剧或与契诃夫相关的书。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那五年的苦读，就不会有五年之后的井喷式的写作。

所以，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把文革结束的1976年视为人生新的开端。但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是1972年。

我珍藏着两样1972年留下的纪念物。一件是《工厂姑娘》最后一幕的译稿。上边注明，我是1972年5月16日下午3时坐在河南信阳一家冷饮店里开始翻译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72年5月17日下午3点44分于信阳第三招待所第67号房间译完。”另一件是我1972年10月19日领到的北京图书馆阅览证。一次记者傅玲来家采访，她眼光敏锐，很看重这个文革时期的阅览证，拿回去扫描制版，与她写的采访记一道登在了《新剧本》2005年第4期上。

1977年，我的生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危机。我得了一个来势凶险的怪病，协和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我的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都匆匆赶来医院探视了。但我那时脑子非常清醒，我在病床上暗下决心，如果闯过鬼门关，将一门心思地写文章，把脑子里的全部积累统统形诸文字发表出去。1978年养病一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节点——1979年。那年我42岁。

从1979年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两万余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起，我的一篇又一篇文章鱼贯般地出笼，到1983年结集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论文集《他山集》，我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一个相当活跃的戏剧评论人。

在这三十余万字的文章里，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梅耶荷德的贡献》。因为我对这位20世纪杰出戏剧革新家及其假定性戏剧理论的宣传，也结识了20



世纪 80 年代两位中国的戏剧革新闯将——上海的胡伟民和北京的林兆华，成了他们的朋友。

几年前焦晃先生来北京排演《Sorry》，我们一见如故。焦晃对我说：“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胡伟民的朋友。”

我也曾经设想过，如果没有 1977 年的那场几乎要夺走生命的大病，我是否能有后来在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三十万字的干劲？大概不会的。从而我知道了祸福相依的道理。

《他山集》之后，我写了第二本关于戏剧的书——《戏剧笔记》（1993）。这本书开宗明义，说了一个观点：“戏剧像个女人一样，有两个家。一个是娘家——文学，一个是婆家——艺术。”几年后我到郑州讲学，河南大学的苏永旭老师对我说，他就是因为读到了“戏剧像个女人一样有两个家”之后，便一口气把《戏剧笔记》读完了。在异地他乡，能遇到像苏先生这样的知音，是件快事。

大概是五年前，有一次开会，在会议桌的另一端，《中国文化报》的赵忱对我说：“童先生，你是一个幸福的人。”我问“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她说“因为你和戏剧结缘。”

她这话有道理。我以戏剧评论人的身份“与戏剧结缘”，就会接触很多卓有成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而凡是有成就的戏剧家，无一不具有人格魅力。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人生的道理与戏剧的真谛。

记得 2006 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佐临百岁生日的会上，我曾说过：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幸亲身体验到佐临先生的人格魅力，后人将因此而羡慕我们。

我见过黄老两次，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北京，两次都有会心的交谈。他说，对戏剧应该有一个纵向发展的了解，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戏剧，这样就能明白戏剧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发展着的。我后来在给《世界经典戏剧全集》（2000）写总序时，就把黄老这一思想写进去了。

知名的剧作家也让人敬仰。像我认识的已故剧作家黄宗江、王正、李龙云都是心肠柔软而骨头坚硬的好人。宗江、龙云去世后，我都写了悼念文章，发在《新京报》上。我也曾怀着深情为王正的一个戏写了剧评。王正夫人读后曾写信向我致意。

我最早认识的前辈演员是董行佶，从他身上我知道了“戏比天大”的道理，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最后一个牧羊人》，痛感像他那样为戏“而生、而狂、而疯、而死”的演员此后再也不会有了。

在新一代的演员中，我接触较多的是濮存昕。在与濮存昕的多年接触与数次长谈之后，我们在2002年合作出版了《演员濮存昕》。后来联合记者孙小宁，三人一起写了本更有价值的《我知道光在哪里》（2008）。

1980年的一天，《中国戏剧》的编辑凌霄来我家约稿，我就成了这家杂志的撰稿人。1989年我参加由已故导演郝钢发起并举办的南京小剧场戏剧节，与《中国戏剧》副主编王育生先生住一室，我问：“老王，你们那时怎么想到向我约稿的？”他答：“是老于和刘厚生，于是之有一次来编辑部，他说，有一个叫童道明的，你们不妨让他给你们写写文章。”于是我记起中国剧协老领导厚生老师的儒雅风度，他一见我总会笑眯眯地叫我“道明”，而由于得到于是之老师的眷顾，我一步步地走近了这位真正的大师，成了他的一个学生和朋友，这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

2014年1月18日，在首都图书馆举行的纪念于是之逝世一周年的讲坛上，我说：“我常对人家说，于是之和濮存昕这两个人是不会搞阴谋诡计的，”竟赢得了听众席里的一片掌声。

我戏看得很多，但看得最多的，剧评写得最多的，还是北京人艺的戏，我评论过林兆华导演、锦云编剧的《狗儿爷



涅槃》，苏民导演、郭启宏编剧的《李白》，也评论过任鸣导演的《北京大爷》、李六乙导演的《北京人》……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话剧的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几出所谓“有争议的剧目”，如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王贵导演的《WM》、陈颢导演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在激烈的论争中，我写过剧评，盛赞过这些充满创新精神的演出。

最令人难忘的演出，发生在 1992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于是之等人艺第一代演员作《茶馆》告别演出。有感于这场演出催人泪下的悲壮谢幕，我写了篇题为《这可能是绝唱》的文章，《北京晚报》把它当做散文发表，由此我也开始了散文创作。1996 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惜别樱桃园》问世。这一年我 59 岁。

这本书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责编让我在书勒上写一句最想说的话，我写了“喜欢联想与善良”这七个字。我是这样想的，写散文需要心脑并用。脑子应该成为一个有敏感感应力的“联想集团”，而心呢？应该是一颗善良的心。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一篇文章，就是用作书名的《惜别樱桃园》，它是这样结尾的：“谢谢契诃夫……他启发我们这些进入 21 世纪的人，和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惜别樱桃园》出版后不久，《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来采访，也以“惜别樱桃园”为题发了篇短文。里边有一句让我读了挺开心：“童先生做的是活学问。”我的确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

我记不清与是之老师有过多少次倾心的交谈了，有一次最刻骨铭心。那次谈话是在紫竹院公园的湖边进行的，时间不是 1994 年就是 1995 年。他与我谈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

运，作为一个戏剧人，他以为“最大的遗憾，是很少有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我顿时感到了这句话的千斤重量，这也是他说过的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话。后来我写了篇谈论“知识分子与戏剧”的文章发在《剧本》月刊上，而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戏剧处女作《我是海鸥》已经成形。

《我是海鸥》是1996年写的。这一年恰好是契诃夫名剧《海鸥》问世100周年。我写这个剧本也有向契诃夫致敬的意思。同时，我也想在第一个剧本里，把我对戏剧的精神价值的认识表达出来。这个剧本以导演和观众的直接交流开始：

“朋友们！我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是因为这个美丽的《海鸥》，我们在生活中相遇了，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现在都在剧场里，剧场是什么？剧场是一群有共同的精神追求的人团聚的地方，在艺术之神的眷顾下，他们在这里互相交流，互相取暖……”

2004年，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大的纪念日——契诃夫逝世100周年。

这一年，北京破天荒地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口号的国际戏剧节。戏剧节的开幕戏是王晓鹰导的《普拉东诺夫》，闭幕戏是林兆华导的《樱桃园》。这两个演出都用了我的译本。我也总算为这个戏剧节出了点力。

也是在这一年，在已故王炜先生与孙立峰等朋友的策划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了我主编的纪念文集《百年契诃夫》，共四本书，一本是我撰写的契诃夫评传——《我爱这片天空》，一本是我编选的契诃夫作品集——《忧伤及其他》，还有两本我的译著——《札记与书信》和《戏剧三种》。作为这四本书的补充，我在2008年与《阅读俄罗斯》一起出版了《阅读契诃夫》。

也是在这难忘的2004年，我和王晓鹰导演到北京图书馆



去作了一次讲座。主持人蔡萍女士先说开场白：“五十年前，我们请汝龙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小说，今天我们请童道明先生和王晓鹰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戏剧。”我听了心里还真有点感动。

我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另一位导演——查明哲，也有一次一同讲课的经历。那天是2009年5月16日，由单向街书店组织的，在圆明园东门外一片槭树林里讲契诃夫的《樱桃园》，现在想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讲座结束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文导微走过来对我说，她读过我的《阅读契诃夫》，很喜欢《玩笑》那一篇。后来我发现，不少读者喜欢契诃夫这篇写得像童话一般美丽的小说。

我还认得在北师大读博士的米慧，毕业后她回东北教书。2013年10月18日那天，我意外接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童老师，我正在‘全国高校俄语大赛开幕式’现场，正在致辞的是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他讲到了您，大段引用您的《阅读俄罗斯》和《道明随笔》。我感到好亲切啊！”米慧的短信也让我感到亲切。我很羡慕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因为他们几乎可以天天接触像米慧这样的好学生。《道明随笔》也就是连载在米慧的导师夏忠宪教授主编的《俄罗斯文艺》上的。

我与查明哲导演还有一次愉快的合作——2003年我们一起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成了话剧，后来由查导将它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开幕戏搬上了舞台。这个剧本，我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贡献，但明哲却在编剧一栏里，把我的名字放在他前头，害得我常要作出更正声明，不敢掠人之美。

到现在为止，在人们的印象里，我首先是个“戏剧评论家”。我还记得，最早认真地称我是“戏剧评论家”的是剧作家过士行，那大概是1983年，那时过先生还是《北京晚报》的一位跑戏剧口的记者。一天他带了《中国日报》一位

女记者来看我。刚一坐定，就说：“这位童先生是戏剧评论家，他的特点是，如果见到桌子上放着一个苹果，他就说：这是个苹果。”美女记者听了浅浅一笑，以为他是在说着笑话损我，但我听出来过先生是在幽默地捧我。

我主要是评论话剧，偶尔也评论戏曲。头一次参加戏曲界的活动，是经龚和德先生的推荐，去杭州看了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西厢记》，回来还写了篇评论茅威涛演技的文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评论电影和电视。我进入电影评论队伍，是因为当时《电影艺术》主编罗艺军先生，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的余倩教授、刘诗兵教授、林洪桐教授、郑洞天导演等朋友看得起我，吸纳我去参加一些关于电影的讨论。而撰写电视评论文章，则主要是已故蔡骧老师提携的结果。关于电影，我写过一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论电影的假定性》。电视评论则是小文章居多，其中有些收进了我与蔡骧、余倩两位学长合著的《影视评论三人集——文化的魅力》（1995）。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戏剧圈外的人也知道我是“戏剧评论家”了呢？大概是2006年吧。这一年，在北京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晚报》和拥有众多知识分子读者的《新京报》，先后刊登了整版的介绍我的文章。《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是“名家”版编辑蔡岫约请谭宗远先生撰写的，《新京报》上的文章是该报记者天蓝自己写的。《北京晚报》还配发了一张我年轻时代的照片。第二天楼里的几位邻居见我就说：“童先生，你年轻时长得挺精神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现代人虽然寿命长了，但还认为70岁的生日是值得庆贺一下的。演员同时也是一家文化公司老总的朱敏怡为我在萃华楼摆了一桌，赴宴的有王贵导演、林兆华导演，还有濮存昕和张子扬。那天拍了好几张照片，有一张用到了《我知道光在哪里》，濮存昕给这张照片写了个



说明文字：“与我的师长们合影，这天是童先生生日。”

说起与戏剧界人士聚餐，还有两次难忘的饭局。

一次从中戏开会出来，徐晓钟老师请我在一家餐厅吃便饭。我们聊了不少戏剧方面的话题，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在话剧导演中，李六乙是很懂得戏曲的。我们对他应该有所支持。”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那正是六乙处于困境的时候。晓钟老师显示了他作为“戏剧良知”的本色。又有一次是林永健做东，也是恰逢我们从中戏开会出来“相遇”，他执意要请我吃饭，理由是我曾经表扬过他。他开了一辆吉普车，说“这车是吴军的，您也表扬过他，这次就算我和吴军一起请您了”。我才意识到，夸奖一个其时还籍籍无名的人才，虽是评论家的举“嘴”之劳，却是功德无量的善举。真的，我喜欢赞扬青年才俊，张仁里老师成功栽培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同学，我早早就赞美过的呀。除了北京的青年明星外，我也称赞过上海的奚美娟、大连的夏君、广州的高侠等等。西安的霍秉全先生现在还记得我1985年写过剧评赞扬他的戏剧处女作《一念之差》。

做评论工作，免不了要参与论争，80年代戏剧界的一场最大论争是历时五年的关于“戏剧观”的论争。现在的研究者在描述这场论争的初始，大都要提及我的那篇发表于1983年的《也谈戏剧观》。现在我想起这场论争，让我记住的倒是论争双方的君子之风。在这场论争中，我的观点是和马也先生迎面相撞的，但却并未伤及感情，现在有时在会上见面，彼此还像老朋友那样亲切。我写过一篇题名《我们这个队伍》的文章，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可爱的戏剧评论队伍，还特别表达了对已故评论家康洪兴先生的怀念。

2009年是我生命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在这一年我的剧本头一次刊登在了杂志上，也头一次登上了舞台。我终于走出戏剧的书斋进入了戏剧的现场。这一年我72岁。

但这个剧本不是我的戏剧处女作《我是海鸥》，而是我2005年动笔写的以诗人冯至为主人公的《赛纳河少女的面模》。

刊登这个剧本的杂志是中国剧协机关刊物《剧本》月刊，那时主持日常编务的是黎纪德先生，他幽默地称我是“编剧新秀”。后来王育生先生写了篇《为“破门而出”叫好！》的文章发在《剧本》上，为我的“衰年变法”打气。在我作为编剧走向剧坛的道路上，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

演出这个剧本的剧场，是王翔先生主持的蓬蒿剧场。这家民营剧场标举“远离商业，走近文学”，我认定这个有冯至、季羡林登场的剧本在这样的剧场演出很合适。

我们选择冯至先生生日——9月17日那天首演，在蓬蒿剧场演了之后还到北京大学为中文系的师生演过一场。

导演张子一很年轻，也很有才华，她把剧本排成了一出“朗读剧”，王晓鹰导演看了表示肯定，说“这也许是这个剧本的最恰当的舞台表现形式”。初登舞台，我们把身段放得很低，没有对演出作什么宣传的规划。来看戏的媒体人，都是与我相熟的朋友，像《人民日报》的徐馨，《新京报》的李耀军、天蓝，《北京日报》的解玺璋，《北京晚报》的孙小宁、王润，《南方周末》的石岩等。但对这次首演作了生动报道的，却是《深圳商报》的驻京记者田泳。我那时还不认识她，是我的同事张晓强带她来看了戏。

这个戏的开演之前，我们安排了一个朗读冯至诗作《那时》的环节。首演的幕前朗读人是濮存昕。北大那次的场面更是壮观，因为是在演出结束之后，由敬一丹领着观众一起来朗读的。演员朱琳、北京电台主持人罗兵也来剧场朗读过这首诗。后来又通过北师大邹红教授、北京五中于爱民老师请来两位博士生和一群中学生作集体朗读。冯至1947年写的《那时》，的确是一首非常感人又适于朗诵的诗：“那时像离开马棚的/小马，/第一次望见平原；/那时像离开鸟巢的/小



鸟，/第一次望见天空。/前面是旷远。/前面是清明……”

2007年，中国话剧一百年，曾有记者问我：“当今的中国话剧欠缺什么？”我说欠缺悲剧意识。这就决定了当我自己执笔写戏的时候，必定会张扬起我的悲悯情怀。

在蓬蒿剧场演过《赛纳河少女的面模》之后，我随即把《我是海鸥》交给了王翔先生。经由穆德、王绍军两位导演的努力，这出剧很快被搬上了舞台。与此同时，林蔚然也把《我是海鸥》刊登在了由她主持的《新剧本》上。

我们选择契诃夫诞生150周年——2010年1月30日那天首演。那天上午，北京的五六十位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同行们在蓬蒿剧场集会，纪念契诃夫；下午便留下来看《我是海鸥》，他们很宽容地接受了我笔下的这个契诃夫形象。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是两出没有笑声的戏。其实我本人是个爱幽默的人。1994年外文所建所30周年的庆典上，主持人陆建德在正规的礼仪后点名要我上台说个幽默。那天高朋满座，群贤毕至，季羨林先生就坐在主宾席上。我当然要说不伤大雅的幽默。于是我说了个有关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幽默。几个月后，华东师范大学倪蕊琴教授写信告诉我说，她在课堂上把我这则幽默说给了学生听。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演出之后，我已经收不住手了。我一鼓作气又写了三个剧本——《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蓦然回首》。而这一切都是与能得到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的。

我这里只想表达一下我对两位已经过世的朋友的思念。

一位是中国话剧研究会秘书长王福麟先生。他看过我全部五个戏，也真心欣赏我的剧本，我可以推测，2011年《我是海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优秀小剧场戏剧会演，与他的举荐不无关系。我还想说，他是一个真正全身心地为中国

话剧事业服务的戏剧人，他最后是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的。

一位是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2010年9月19日，《我是海鸥》在南京大学演出。看完戏后，余教授对我的研究生苏玲说：“我在想，童先生真年轻。”第二天吃早饭，与余教授相遇，他又对我重复了一遍：“看了你的戏，知道你的心是年轻的。”这是一个老教授的感觉。

而《新京报》记者陈然2012年12月6日发表的一个访谈记里，说我“在75岁的年纪，依旧洋溢着青春浪漫的气息”。在《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新书发布会上，任明炆导演也说：“童先生是个苍老的年轻人。”这是两个年轻人的印象。

写作，如果写作者有个体生命的真正的投入，是能在精神上焕发出青春活力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契诃夫会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了”。

而戏剧创作是要和青年演员们打交道的，他们也乐于与我分享他们的快乐。2013年7月的一天，杨轶向我报喜：“童老师，我和晓丹已经领证了。”杨轶与晓丹2011年主演《我是海鸥》，在排戏的过程中两人相爱了。那年中秋节，晓丹给我发了条短信：“童老师，谢谢你让我演了一出真正的话剧，也让我认识了杨轶这个好小伙子。”

我们好说“以文会友”。实际上“以戏会友”的能量要大得多。如果不是有了这几个戏，我大概直到今天也无缘结识中央戏剧学院的陈珂教授、李亦男教授；剧作家万方女士与作家闲云女士等新朋友对于我剧作的关注，则更加坚定了我在戏剧写作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心。而钟海院长读了《秋天的忧郁》就决定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王延松导演说我的戏“需要有文学癖好的演员来演才能体现出编导的意图”，剧作家沈虹光在武汉看了《赛纳河少女的面模》之后说“这是一个奢侈的夜晚”，这些都让我有了“海内存知己”的感觉。